

[陕西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

## 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陕北方言探讨

孟万春

(延安大学文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陕北方言和文化涵养了一批著名作家、艺术家及经典作品。延安革命时期,陕北方言的地位和价值很高,第一次全面进入文学作品,并成为文学语言的主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敬之《回延安》充分利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和特征,实现了形式单纯与内容深刻的和谐统一。新时期文学中,伴随着乡土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回归,陕北方言的独特魅力重新被发掘。陕北方言经过路遥的精心采撷、加工,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学语言风格。

**关键词:**文学作品;文学语言;陕北方言

**中图分类号:**H1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2914(2020)01-0044-05

### The Discussion of the Northern Shaanxi Dialect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ks

MENG Wanchun

(School of Literature, Yan'an University, Yan'an 716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The dialect and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Shaanxi have cultivated a number of famous writers, artists and classic works. During the Yan'an revolution, the northern Shaanxi dialect had a high status and value.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t entered literary works in an all-round way and became the leading literary language. After the liberation, He Jingzhi's Back to Yan'an made full use of the for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Xintianyou, a folk song in northern Shaanxi, and realized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simple form and profound content. In the new era literature, with the awakening and return of local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he unique charm of the northern Shaanxi dialect words is rediscovered. Lu Yao is the epitome of the northern Shaanxi dialect, who has formed his unique literary language style through careful collecting and processing of the dialect.

**Key words:**literary works; literary language; the northern Shaanxi dialect

陕北方言和文化涵养了一批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也孕育了一批优秀作品。延安革命时期,扎根于陕北方言与信天游基础上的《王贵与李香香》是现代诗歌史上的经典。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丁玲、孔厥等的部分短篇,以及戏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亦是名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敬之的《回延安》是一首开一代诗风、里程碑式的作品。它大量使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手法,实现了形式单纯与内涵深刻的和谐统一,又对信天游

这种古老的民歌形式有所发展和创新。新时期文学中,伴随着乡土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回归,陕北方言的独特魅力重新被发现和挖掘。在现当代著名作家或诗人像丁玲、欧阳山、李季、柳青、贺敬之、史铁生、路遥等的作品中,都大量使用了陕北方言。

#### 一 延安时期文学作品中的陕北方言

延安时期,大量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满怀抱负地从全国各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他们操着天南海北的方音走到一起,需要一个区域共同语作为陕甘

收稿日期:2019-10-28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16年度一般项目(YB135-25)。

作者简介:孟万春(1973—),男,陕西商南人,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

宁边区的工作语言、宣传语言、文学语言。陕北方言无疑扮演了这一重要角色。这一时期,陕北方言的地位和价值是空前的,它第一次全面进入文学作品并成为文学语言的主导。

20世纪,学界爆发了两场关于现代汉语的革命。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一是延安时期的大众化文学语言革命。五四白话文运动用“白话”代替在中国占据两千年统治地位的书面语——文言文,而延安时期运用大众化口语来弥补“五四白话”过于欧化、缺乏原创性的语言弊病,无疑是对“五四白话”的一次反拨,这对维护现代汉语的纯洁性和规范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曾对“五四白话”有过这样的评价:“白话文成了一种披着欧洲外衣、负荷了过多的西方新词汇,甚至深受西方语言的句法和韵律影响的语言,它甚至可能是比传统的文言文更远离大众的语言。”<sup>[1]</sup>那些来自西方的新概念、新术语、新范畴和新话语方式及大量的音译外来词和汉语中夹杂着外来语词的恶性欧化现象不仅仅是“五四白话”的弊端,也是早期延安文学的通病。延安时期很多作家深受苏俄文学的影响,他们小说的语言风格往往带有浓郁的苏联味道。比如周立波的《牛》原本是描写陕北黄土高原的农村,但是经周立波一写,完全没有陕北味了。如:

他常常拿了他的老婆的梳子,蹲在牛栏里,好久好久地,梳着母牛腿上的毛。

他更爱小牛,是这样爱着这小东西的憨态,以至于引起了他的三岁女儿的嫉妒,她常常打着小牛,用干树枝,或是用土疙瘩。看到这事情,他责骂他的女儿,但也忍不住笑着。

这样一个场景,“与其说是从陕北农村的现实中来,毋如说更多地是从作者熟读并热爱着的俄苏文学文本中来”。<sup>[2]</sup>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周立波在《后悔与前瞻》里自我检讨道:“有人要我写乡下的事,我只能写牛生小牛的事情,对于动人的生产运动、运盐和纳公粮的大事,我都不能写。”<sup>[3]</sup>作家用自己满脑子里苏俄小说中的语句来描写中国陕北边区的农民生活,显得很不得搭调。可见这一时期的作家还不清楚“谁在说”“说什么”“怎么说”的问题。他们缺乏生活体验,不了解工农兵大众生活,甚至听不懂群众的语言,所以难以真实地书写陕北农村生活。至此,延安文学语言的变革在所难免。

毛泽东继《反对党八股》之后,又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强调了知识分子语言改造的根本意义,并将大众化问题最终归结为语言问题。反复教导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向工农大众学习,接受他们的教育和改造。“一切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sup>[4]</sup>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向工农兵学习语言,从而消除与他们的心灵隔阂。“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sup>[5]</sup>在《讲话》之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掀起了下乡热潮,也掀起了学习工农兵语言的高潮。而工农兵语言究竟是什么?它很抽象,并不是一种统一的具体的语言。在陕甘宁边区,工业寥寥无几,工人阶级更无从谈起,怎么去学习他们的语言?学习士兵的语言?而士兵绝大多数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各种方言杂处,无法去学习。这样一来,鲜活而生动的陕北方言无疑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争先学习的对象。于是,无论是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甚至文学批评的语言中都大量融入了陕北方言。陕北方言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进入文学作品中并成为文学语言的主导。丁玲也在反思自己的语言问题,“老百姓的语言是生动活泼的,他们不咬文嚼字,他们不装腔作势,他们的丰富的语言是由于他们丰富的生活而产生的。一切话在他们说来都有趣味。一重复在我们知识分子口中就干瘪无味,有时甚至连意思都不能够表达。我们的文字也是定型化了的老一套”。<sup>[6]</sup>

在文学创作中,陕甘宁根据地的作家们较早地尝试用陕北方言进行文学创作。其中,李季在陕北方言与信天游基础上创作的《王贵与李香香》是现代诗歌史上的经典。李季在《兰州诗话》中谈到创作动机、写作目的以及作品价值的时候说,“我觉得口语化,也就是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语言、形式来写诗,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应当都是每一个写诗的人的严重任务”。<sup>[7]</sup>正因为如此,诗人李季带着浓重的河南乡音,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陕

北方言的学习中去。他十分纯熟地把陕北方言运用到诗歌创作中,既能编唱陕北民歌,又能以陕北方言写诗。如何使陕北方言与诗歌、特别是与民歌体新诗联姻,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成为李季在那一阶段的创作目标,《王贵与李香香》就是这种努力求索下的经典之作。<sup>[8]</sup>《王贵与李香香》完全口语化、民谣化,文人诗学所看重的“意境”“气韵”“辞采”被舍弃,也舍弃了以个性主义、理性主义为内涵的“五四”自由诗传统,朝着民歌、鼓词、顺口溜之类口头文学风格发展。<sup>[9]</sup>陕北地处黄土高坡,历史上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长期征战的要地,也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地区。这种多民族、多族源混居为陕北方言文化注入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王贵与李香香》运用陕北民歌、陕北方言表达了丰富而独特的地域文化,塑造了一个个典型的文学意象。

延安时期的小说中陕北方言随处可见,下面摘录一些例句:

(1)你到底是哪搭人,你说的话咱解不下。不懂,不知道、不明白嘛!(丁玲《一颗未出膛的子弹》)

(2)梁先生还怕文印一出大门又慢下来,想再跑出去瞭一瞭。看、望。(柳林《转变》)

(3)可是也不肯吃一点芝麻大的亏,成天价陕北方言词,相当于普通话“地”守在屋子里,把屋里炕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周而复《麦收的季节》)

(4)桂英拭去脸上的唾沫,赔罪道:“我没哭,我没说熬劳累!”(梁彦《磨麦女》)

(5)后面接着一群衣冠楚楚的,虽是受苦汉,也装的一表文雅的“引人的”男方到女方去迎娶新娘的人,一般为男方至亲和“送人的”结婚时女方陪送新娘到男方家去的人,一般为女方至亲。(柳青《喜事》)

(6)我赶到枣林坪区,眉眼脸晒得红格粗粗。陕北方言贬义词,又写作“红圪粗粗”的。(雷加《揽羊人》)

(7)不得了啦,我的生灵也作“牲灵”,指牲口难活生病啦!(欧阳山《黑女儿和他的牛》)

除了小说语言之外,当时的秧歌剧等基本上都用陕北方言去创作、用陕北话去演。“我们的秧歌都是用陕北话写的,也用陕北话演,我们在语言上的确比以前那种清汤寡水的普通话活泼生动得多了。”<sup>[10]</sup>甚至就连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中也出现了大量的陕北方言。“先是普通报纸上出现了陕北方言,后来作为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也出现了很多陕北方言。”<sup>[11][470]</sup>陕北方言已经渗透到各种艺术形式当中了,其作用和影响空前。

## 二 陕北方言和《回延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北方言的地位虽然不及延安时期,但仍然得到了传承和发扬。贺敬之是一位在中国当代诗坛上颇有影响的革命诗人。他的《回延安》《放声歌唱》《中国的十月》等被誉为“开一代诗风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回延安》是他较早发表的优秀诗作,这首诗标志着贺敬之的艺术探索与实践趋于成熟。全文运用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热情讴歌了革命圣地延安人民的质朴美,抒发了诗人对延安的赤子情怀。

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为文学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他们的民间文学、方言和歌谣也都为文人的艺术创造输送了宝贵的营养。诗人要深入群众生活,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贺敬之对此有高度的自觉。20世纪40年代初,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的诗歌主要采用民歌体,尤其是陕北的信天游。诗句中的欧化句式和词语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琅琅上口的陕北方言。《回延安》写于1956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首充满感情的诗歌,表达了诗人对延安无限的热爱,对延安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采用的形式是陕北人民喜闻乐见的信天游体,诗的每一节都由两句构成,一节一韵,反复吟唱,按照信天游的特点,第一句起兴,有时候两句诗兴、比连用。所用的语言,是陕北带有泥土气息的方言,生动活泼。“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羊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诗中的“树根根”“羊羔羔”都是陕北方言,描写了诗人与延安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诗人以自然物象起兴,引出诗人对母亲延安的感恩之心、反哺之情,就好比是树梢树枝与树根,羊羔与母羊的关系。“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响着脚步声”,这里的“米酒”“油馍”“木炭火”“炕”“窑”“脑畔”(窑洞顶上)都是陕北典型的生活风貌,是陕北自远古时期就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给窗纸上贴窗花是陕北黄土高原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是陕北古老的民俗文化。“白生生”是陕北方言中形容词特有的重叠式,类似的还有“蓝盈盈”“红丹丹”“红艳艳”,这些词语具有很强的形象色彩,栩栩如生,比单纯的“白”“蓝”“红”更显形象生动,起到了良好的表达效果。“娃娃们”以前并没有见过诗人,似懂非懂也学着大人们的样子抢着和他握手。诗人用孩子们天真嬉闹的情景描绘出一幅浓浓的、惬意的农家欢乐图。

这首诗中还运用了不少陕北方言中另一种比较特殊的叠音词模式,即名词或数量短语重叠成ABB式,饶有情趣。如“几回回”“树根根”“羊羔羔”“一口口”等,这些重叠后的词汇可以表示亲昵、喜爱、细小等感情色彩。总之,《回延安》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诗的语言朴素、优美而含蓄,韵律和谐、节奏鲜明、铿锵有力。而这一切都是从生活、从群众、从陕北方言和民歌中撷取的。诗人对陕北的人情风貌、信天游、陕北方言非常熟悉,使用起来信手拈来,使诗的形式和内容达到了完美统一。

### 三 陕北方言与路遥小说

新时期文学中,伴随着乡土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回归,带有浓郁的乡音和乡愁的方言土语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插队到延安的北京知青史铁生、陕北本土作家高建群、路遥等对陕北方言的运用,已经达到娴熟自如的境界。在这些当代作家中,路遥写乡村特别重视地域性,而陕北方言无疑是表现陕北独特地域文化的良好载体。

#### (一) 善用陕北方言

路遥小说语言的最大特色是对陕北方言的挖掘、改造和使用。叶圣陶先生在谈到文学创作中使用方言的问题时指出:“方言土语的成分也不是绝对不用,只是限定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譬如作品里某个人物的对话,要是用了某地区的方言土语,确实可以增加描写和表现的效果,这就是个特定的情况,这时候就不妨使用。又如作家觉得方言土语的某一个成分的表现力特别强,普通话里没有跟它相当的,因此愿意推荐它,让他转成普通话的成分,这就是个特定的情况,这时候就不妨使用。”<sup>[12]73</sup>

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地域特点和个性特色是普通话无法替代的,如果将这些散落在民间的语词经过发掘、改造后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去,可以收到奇特效果。路遥在这条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并获得了巨大成功。用陕北方言进行文学创作并不是始于路遥,如柳青等。柳青在作品中对陕北方言的运用相对拘谨,他主要在小说的人物对话中使用方言,而在叙述故事情节过程中多用普通话词语。而路遥对陕北方言的运用可谓达到一种新境界,“他不仅在小说人物道白中多用陕北方言,而且把陕北方言融汇在作品的整个叙事话语系统之中,将方言作为地域文化材料,努力发掘其文化内涵,为展示陕北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服务”。<sup>[13]</sup>这样,路遥的小说就成为完

完全全的“陕北式”小说,给读者展示了陕北黄土高坡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强化了陕北文化的意味。路遥对陕北方言近乎痴迷的追求促成了自延安时期以来陕北题材文学传统的又一次创造性转化,实现了陕北方言的华丽转身,使陕北方言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影响达到顶峰。

陕北是路遥的故乡,生于斯、长于斯,陕北的文化早已植根于他的头脑里,当他反刍经验意识的时候,伴随而来的陕北文化元素也自然流淌出来。这时陕北不仅是他的故乡,更是他的精神家园。他对陕北方言和民俗十分熟悉,再加上个人的天分和勤奋,他不断地从群众的口语中去吸收、挖掘、创新,在作品中赋予陕北方言鲜活的生命力。

在《平凡的世界》中,贺秀莲吵着少安要分家,少安极不情愿,内心很痛苦。孙玉厚就安慰儿子说:“你千万不要怪罪秀莲!秀莲实在是个好娃娃,人家从山西过来不嫌咱家穷,几年来和一家人搅在一起。门里门外操劳,一点怨言也没有,这样的媳妇尔格哪里能找的见?人家娃娃没拨弹,已经仁至义尽了!”这里使用了富有地方特色的陕北方言词汇“娃娃”“搅”“尔格”“拨弹”,寥寥数语便勾勒出陕北老汉的善良、质朴和善解人意,恰到好处的人物方言道白,充分体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人生》中刘巧珍主动追求高加林时说,“加林哥!你如果不嫌我,咱们两个一啫里过!你在家盛着,我给咱们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这句话简短、朴实,却极具真情,这个多情的女子在表达对心上人的爱慕之情时,是何等大胆、率直与热烈,《诗经》中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在今天的陕北民歌中处处可见。

#### (二) 用方言体现陕北人的个性特征

同为陕北人的老一辈作家柳青以及出生于关中的杜鹏程在文学上都取得了很高成就,但他们的作品却远不如路遥作品中所散发出来的浓厚黄土气息和文化色彩。究其原因,路遥有更为自觉的文化意识和对陕北文化的迷恋。陕北方言在他的作品里不仅仅是流淌在人物对白之中,更是冒着外地读者看不懂的风险深入渗透到作品中每一个人物的毛孔里。下面摘录一些《路遥文集》:

(8)(高加林)匆忙地进了村,上了硷畔,一头扑进了家门。

(9)他刚站在自家窑里的脚地上,就听见外面传来一声低沉的闷雷的吼声。

(10)谁在脑畔山上翻麦地,一口好嗓音又

唱起那令人心跳弹的信天游。

(11)(高玉德)把烟灰在炕烂石上磕掉,用挽在胸前纽扣上的手帕揩去鼻尖上的一滴清鼻涕,身子往儿子躺的地方挪了挪。

(12)糊脑松! 实实的糊脑松! 你他妈的把书念到屁股里了!

(13)玉德老汉说:“那是个犟板筋,不来就算了!”

这里的“硷畔”“脚地”“脑畔”“炕烂石”等等都是描绘陕北地域文化的特色词汇,“糊脑松”“犟板筋”是陕北人的家常用语,真实自然。结构助词用陕北方言的“价”而不用普通话的“地”,可以看出作者对陕北方言的偏爱甚至有点执拗。此外,路遥作品中还大量使用了陕北方言特有的一些形容词重叠式。有ABB式,如:湿润润、水淋淋、黑洞洞、红钢钢、绿萋萋、凉森森、齐楚楚。还有A格BB式,如:绿格茵茵、蓝格茵茵、白格生生、巧格灵灵、水格淋淋、红格腾腾、绿格铮铮、红格艳艳。这些形容词重叠式的使用,一方面使文章很有质感和色泽感,说明了陕北方言词汇的丰富意蕴,另一方面强化了小说的陕北元素。

### (三) 用方言体现陕北民俗民情文化

路遥作品中原汁原味的陕北方言描写,既有陕北方言自身的特点,也有陕北方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他从口头俗语、语音词汇以及饮食服饰、婚丧嫁娶、住行娱乐等方面展示陕北方言文化,无处不体现出浓厚的地方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气息。路遥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恹惶”“受苦”“下苦人”“苦情”“愁帽”“烂包”“刨挖”等方言词汇,折射着世代陕北人面对苦难的痛苦与无奈,自然让人联想到黄土高原的贫瘠和生活的艰难。

陕北地处一隅,这为方言的保留提供了天然的文化生态环境。陕北方言习惯于将人、事与周围生动的自然物象相互比附,相互说明。路遥小说中出

现的“麻缠”“麻利”“压茬”“帮扶”“头梢子”“戳牛屁股”“榆木脑瓜”“瓷脑”“犟牛顶墙”“三锤两棒”“爬熊”“撑棚架屋”等方言词,都与动植物和农业生产有关,“这也正是陕北农耕文化的印记,同时也形象地反映了陕北人的生活与思维方式”。

文学是作家人生体验的感性积累和结晶,是作家对特定时期特定人生的思考与理解,也是特定语言的使用与表现。陕北方言经过路遥的精心采撷、加工,最终打磨成了富有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他的作品中处处流淌着陕北方言,为作品增添了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从而形成了他别具一格的文学语言。同时,随着路遥小说和影视剧的广泛传播,陕北方言也广为人知,两者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 参考文献:

- [1]王跃.《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M]//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 [2]李洁非,杨劼.直击语言——《讲话》前延安小说的语言风貌[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3):51-55.
- [3]周立波.后悔和前瞻[N].解放日报,1943-04-03.
-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6]丁玲.丁玲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 [7]李季.李季文集:第4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 [8]颜同林.陕北方言和《王贵与李香香》[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3):80-82.
- [9]沈文慧.文学语言的农民化——延安文学语言变革初探[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5):114-120.
- [10]张庚.“鲁艺”工作团对于秧歌的一些经验[M].解放日报,1944-05-15.
- [11]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 [12]叶圣陶.关于使用语言·出口成章[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
- [13]贺智利.试论路遥小说与陕北方言[J].安康师专学报,1999(4):79-82.